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文库

# 中国：增长放缓之谜

周天勇 王元地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  
经济  
学系  
列丛  
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文库

# 中国：增长放缓之谜

周天勇 王元地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增长放缓之谜/周天勇,王元地著.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6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陈昕主编.当代经济学文库)  
ISBN 978-7-5432-2851-1

I. ①中… II. ①周… ②王…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增长-研究 IV. ①F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6846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装帧设计 王晓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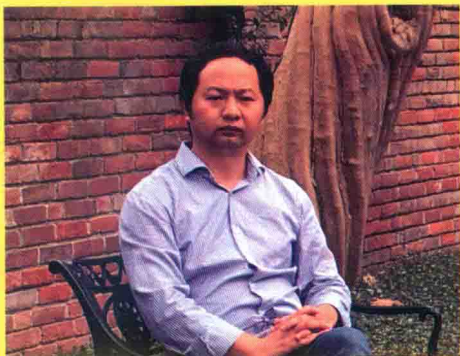
## 中国:增长放缓之谜

周天勇 王元地 著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3  
字 数 320,000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851-1/F·1099  
定 价 65.00 元



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上发表过《高负债发展模式的金融风险》《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改革的一个关键性理论供给——企业体制成本论》等论文；主持和撰写原国家经贸委《“九五”期间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债务重组方案设计》、国家发改委《财政体制十年改革框架性方案》《中国土地和住宅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等委托课题；出版有《劳动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型》《高级发展经济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等著作。



王元地，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与人合著出版有《繁荣的轮回：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一个逻辑解释》《中国自主创新政策评价研究》《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等著作。

## 主 编 的 话

---

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本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学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最新的经济学通用教材。

20 多年过去了，本丛书先后出版了 200 多种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二是培养了整整一代青年

经济学人，如今他们大都成长为中国第一线的经济学家，活跃在国内外的学术舞台上。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引进翻译出版国际上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同时，我们更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自主的理论框架内消化和吸收世界上最优秀的理论成果，并把它放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筛选和检验，进而寻找属于中国的又面向未来世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学真正立足于世界经济之林。

我们渴望经济学家支持我们的追求；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厉声

2014年1月1日

# 前言：给增长放缓一个较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

本书试图解释的是中国这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几大主要和内在的原因，这一研究成果能出版被感兴趣的读者们看到，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欣慰。

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4.2%，2008年开始速度放缓，一直到2011年的9.5%，还在8%以上的高位上。这段时间里，国内外经济学和政策界的人士，大多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持乐观的看法，并没有意识到速度将来会持续地下行。而2012年增长速度跌到7.9%，一直到2016年为6.7%，若从2008年算起，增长速度下行的时间长达9年之久。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世界经济的复苏，都应当是较为忧虑的事情。在2013年8月，我觉得可能传统的增长模式遇到了问题，<sup>①</sup>但是国民经济下行的内在传导和形成机理是什么，我自己也并不是十分清楚。

其间，我也看了一些经济学家们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各种经济学分析，将其对比一些国家和地区同发展水平时期的数据，总感觉这些观点和论据

---

<sup>①</sup> 周天勇：《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局》，《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8月20日。



有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于是从2013年末开始，我着手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行探讨，想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 研究的起因与初步工作之文献

做这项工作的起因是对其他关于经济下行观点有关数据对比的误差。经济增速下行一种主要的论据为，2011年时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达到10000多美元，按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阶段来看，这样的人均GDP水平上，经济增长从8%以上的高速自然向中速甚至很快向低速调整。<sup>①</sup>另一种论据是，中国这次经济增速下行，主要是因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世界经济波动传导的；中国城市化水平还在50%多水平上，人均GDP水平也较低，有后发优势，从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城市化向75%—80%推进，人均GDP向高收入水平迈进，这样的阶段都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sup>②</sup>

但是，就第一种经济增速下行解释的数据对比看，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在1998年和2003年，从人均GDP 14000汇率美元和12000汇率美元时跌到8%以下速度的。而中国2012年跌到8%以下时，人均GDP为5500美元左右。考虑时间价值的前后变化因素，折算成购买力平价，中国2012年发展水平与二者相比，相差了一半以上。简单说，相比起来，发展水平还没有到速度跌下来的那个分界点上，8%以上速度的高增长时间应当还有10—15年。这似乎会证明的是，第二种论述可能是对的。

然而，就第二种经济增速下行解释的数据仔细对比看，欧美最不景气的2008—2011年，其实是中国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年份；而欧美经济增长有所恢复时，反而是中国增长速度放缓的时期。因此，直接证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就是欧美经济波动造成的，似乎理由并不十分充足。另外，当时我们对比的人口生育率、人口增长速度、人口中位年龄、65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

---

① 刘世锦：《增长速度下台阶背景下的发展方式转型》，《经济研究》2011年第10期。

② 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要放到全球背景下看》，凤凰财经，2015年9月12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910/13964878\\_0.shtml](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910/13964878_0.shtml)；林毅夫：《需要厘清经济下滑的原因》，《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14日。

例，都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从8%速度跌下来那年的这些数据偏差很大。我们也发现，在5500美元发展水平上，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不应当在51.27%，更不应该的是市民化的户籍城市化水平仅有41.2%。当时我猜测，国民经济8%以上速度增长本应该还有10—15年的宝贵时间，是不是由于人口增长放缓、结构老龄化和人口迁移障碍等方面的原因而丧失了昵？

笔者的研究从研读人口与经济关系各种不同观点的国内外文献，特别是贝克尔等家庭经济分析、人口增长转型等著述，以及整理分析中国1949年以来人口数据开始。<sup>①</sup>在这些工作中，我们了解的是：人口在市场经济中，其生育决策和行为，由其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决定；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阶段中，由于市场机制对人口生育的自然调节，其实人口也从“爆炸”式的高增长，转向低速增长，甚至会负增长。另一个比较重大的发现是：中国1974—1994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1995—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两条曲线的波动方向竟然高度相关。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我们还区分了自主生育和计划生育，指导性计划生育和强制性计划生育，定义了经济主力人口，描述了由于计划生育形成的中国“人口坑”。我们试图通过上述范畴及其相互之间的数理关系，证明20年前对人口的干预，经济主力人口的减少，人口老龄化（青年人与老年人的收入消费率不同）等等，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但是，20年前人口增长速度十分强烈地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一个黑箱式的原因输入和结果输出说明，并没有阐述清楚其中内在的传导机理和机制。<sup>②</sup>

而对于人口迁移受阻，我们前两年中只研究到了人口迁移因土地产权和市场方面的模糊扭曲而“退不出”，因城市中的户籍管制，教育、医疗

---

① 张弥、周天勇：《自主到计划：人口生育和增长变迁——1950—2014年中国人口论纲》，《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32期。

② 周天勇：《中国经济下行之症结与人口问题》，《清华国家战略研究报告》2015年第5期；周天勇：《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的经济后果》，《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内部版）2015年第4期；周天勇：《中国经济下行分析的逻辑框架——基于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的分析》，《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期；周天勇：《诠释经济下行：人口与发展经济学的一些新进展》，《财经问题研究》2016年第10期。

等公共服务的不公平，房价太高等“进不去”，以及提出了中国人口的“钟摆式流动”“青出老回”和“城市中漂泊”等特殊流程。<sup>①</sup>但是，没有从数理和数量上分析其经济损失和增长速度下行的传导机制和验证过程。当然，还研究了可能影响增长速度的税费负担、企业其他成本，以及对外经济的漏损原因。<sup>②</sup>这些工作的成果，虽然陆续在一些刊物发表和集成出版，我还是觉得没有将下行的基础和综合原因解释得较为清楚，层次、结构和逻辑也不是特别清晰。

在2016年初开始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前，笔者又对需要深入分析的框架和内容进行了思考。一是从长周期人口变动造成的消费需求递增或者递减与对应总供给的相互变动中，发现人口增长上行与下行对经济增长上行和下行的影响机理；二是从长周期中财富和收入在阶层中向上流动集中，而各层次收入消费率和收入投资率的不同，论证其传导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结果。<sup>③</sup>后两年左右的分析，就是以此逻辑而展开的。

致使这次从2008年开始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下行，原因很多。我们需要分析的是，一些权重最大、最基础、最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面面俱到、没有主次、碎片化无关联、层面较浅，都不能找出问题重点和相互影响较大的症结。

## 生育管制的经济后果

人口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基础。凯恩斯认为，人口变动因素，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在前期的研究中没有讨论清楚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波动影响的内在和逻辑的机理和机制。在后续深化研究过程中，我们理出了这样一个关联的逻辑过程：（1）人口再生产代际平衡点为人口总和生育率等于2.1；大于2.1人口规模将扩张，速度太高使人口形成“爆炸性”增长，而小于2.1人口规模则会收缩，人口增长太慢，

① 周天勇、王元地等：《繁荣的轮回》，中国财富出版社2017年版。

② 周天勇：《跨越发展的陷阱》，中国财富出版社2017年版。

③ 周天勇：《消费需求不足型经济下行的成因及其治理的供给侧方案——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的一种逻辑框架》，《宏观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

人口快速老龄化。在工业化前中期，人口生育率快速下降到 2.1 水平，并且迅速向 2.1 以下变动，人口结构收缩斜度较大；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将形成一个人口和经济收缩型的社会。从一个长周期看，前面“爆炸性”增长的人口往往形成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主力人口储备，成为冲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强大动力。(2) 从人口增长变动的即期看，新增人口扩张意味着消费需要扩大，但是消费由抚养者或政府的转移支出实现，并且新增人口在一定的年龄之前不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经济领域；新增人口收缩则意味着即期消费需要的减少，原来需要由抚养者转移支付的需求市场被压缩。(3) 当 20 年前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时，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从供给方面看，成为劳动要素进入生产领域，成为经济增长的动能；从需求方面看，其获得收入、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日常消费、买耐用消费品、置房购车，成为有支付能力的人群，从需求方面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当 20 年前人口增长率下行，20 年后劳动年龄人口相对收缩，则一方面进入生产领域的劳动力要素相对或绝对收缩，导致产出增长的动能相对或绝对减少；另一方面，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相对或绝对收缩，导致生产可能过剩或者严重过剩。(4) 在数理分析上，除了模拟前 20 年人口增长与后 20 年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形成模型外，从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消费、居民收入和 GDP 的影响，可分析其增量或者减量效应。即可计算每年新增或者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影响这部分经济主力人口新增或者减少的消费支出、居民收入、GDP 变动。我们发现，当人口增长率曲线上行时，20 年后每年国民经济的消费支出、居民收入和 GDP 产出等增量是递增的；相反，当人口增长率曲线下行时，20 年后每年国民经济的消费支出、居民收入和 GDP 等增量是递减的。在进一步研究中，我们也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20 年前人口增长变动与 20 年后 GDP 增长变动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相关程度也很高。这进一步验证了 20 年前人口增长变动对 20 年后经济增长有决定性影响定律之假说。(5) 当即期人口增长上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也扩张时，由于消费需要的扩大，生产能力的形成往往稍微滞后于消费需要的增长，需求常常大于供给，这时生产自动创造需求；而当人口增长下行，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也下行，由于消费需求相对或者绝对收缩，以往形成的生产能力常常不

能及时出清，供给往往大于需求，生产过剩会成为常态，市场机制在人口失衡再生产中的失效，导致了经济领域中“生产会自动创造需求”萨伊定律的失效，变为不断收缩的消费需求不断地压缩业已形成的生产规模。(6) 由于少子化和人口寿命的延长，人口结构老化，这也是人口变动的重要方面，其对经济增长速度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青年人的收入消费率相对较高，老年人的收入消费率相对较低。人口增长忽高忽低，会使国民经济在周期中一是造成经济的景气和萧条波动，二是由于人口生命期内各阶段的消费内容有所差别，造成国民经济产品和产业结构此起彼伏的波动；而如果人口生育率向下偏离 2.1 代际平衡水平越远，人口结构就会成为倒五星结构，或者纺锤形结构，严重老龄化和少子化，使得国民经济长期陷入低迷增长阶段。

这样我们不仅发现了 20 年前人口增长变动影响 20 年后经济增长速度黑箱式输入输出的假说关系，也大体上讨论清楚了其内在逻辑的关联机理和相互影响的互动机制。

与进行时间较短和力度不强的指导性计划生育的少数国家和地区相比，特别是与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形成的人口变量，如未富先老等，势必会影响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因跨期经济主力储备人口的减少，导致国民经济高增长时间的缩短。<sup>①</sup>

### 阻碍人口流动和迁移的经济损失

中国是一个从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向现代经济和城市社会转型，也即处于二元结构转型过程的发展中国家。刘易斯和舒尔茨等许多国内外经济学家，分析了这种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和迁移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包括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性。也有文献数理或计量分析过人口流动迁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面的讨论相对要多一些。

然而，中国虽然自 1978 年以来，在劳动择业方面逐步放开了人口流动，但是户籍方面并没有完全放开人口的迁移。我们在前期的研究中讨论

---

<sup>①</sup> 周天勇等：《再论生育管制对国民经济的因果影响关系》，《财经问题研究》2018 年第 1 期。

了因农村土地产权和市场，城市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差别，户籍限制和太多的行政挂钩，财产性收入少和城镇房价太高等四方面障碍，使得城市化发生了从农村退不出，向城市进不去，“青出老回”和“漂泊于城市”的场景。

对于农村土地产权及市场、城镇户籍、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房地产等体制改革，学术界和政策界有许多慢改革、变相改革甚至不改革的说法，似乎这样农民收益更大，农民更保险，粮食安全更有保障，社会更稳定。我们这里要研究的是，学术上能不能讨论一套思路和方法，能够计量分析体制阻碍人口流动和迁移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实践和政策应用上，说明过去和目前这样的体制和人口迁移场景，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消费需求、居民收入和 GDP 产出损失，形成了多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并且传导生产过剩，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对此，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逻辑的分析框架和过程：（1）对于二元结构转型，一般的国家在一定的人均 GDP 发展水平上，有一般相近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农业就业结构。2016 年中国人均 GDP 在 8 100 美元发展水平上，过去同发展水平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目前同水平的墨西哥、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国家，其城市化水平分别在 75% 和 70%，农业就业结构分别在 11% 和 15%。我们以较低项为标准值。（2）在 1978 年，中国虽然工业化有一定的超前，但无论是从按照实际汇率折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5 美元左右，还是从农村人口 82.1%、农业就业劳动力 70.5% 看，都是典型的农业型发展中国家。我们假定 1980 年为中国城市化和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型的起始年，再以 2016 年时的数据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人均 GDP 6 000 美元上下水平时期、2016 年墨西哥、马来西亚、土耳其等人均 GDP 8 000—10 000 美元水平的国家比较，就是按后者较低水平保守计算，就会得出中国城市化水平和农业就业比例的偏差：城市户籍人口和城镇常住人口分别为 41.2% 和 57.35%，偏差分别为 28.8 和 12.65 个百分点；而农业就业比例高达 27.7%，偏差 12.7 个百分点。（3）按照标准值和偏差值，我们可以求得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应有的农村人口和现有的农村人口，应有的农业劳动力和现有的农业劳动力。中国还有户籍城市化与常住人口城市化的区别，对于“青出老回”的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到农村的流

程，“在城漂泊”未能市民化的城市人口，我们由于数据的取得问题，只计算了2016年城市户籍人口、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和农村人口三元转型结构。(4) 我们按照研究的需要，建立了最简单的数理模型，即应有城市化水平的消费水平、收入水平，与应有城市化人口与现有农村人口，包括2016年的应有户籍城市化人口和现有的非户籍城市人口及农村人口，其乘积减去低一个层次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就是由于人口未能或者未能彻底市民化造成的消费损失和居民收入损失。从就业结构转移方面看，应有农业劳动力与现有农业劳动力存在偏差，假定这些偏差的劳动力在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其形成的劳均GDP与这些未能转移的劳动力在农业中的劳均GDP之差，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额。这样我们就可能将由于阻碍人口流动和迁移，造成国民经济的消费、居民收入和GDP损失，按照标准值的差距，计算出来。(5)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在人口自由流动和迁移体制下，不存在错过城市化人口，而当体制设置流动和迁移障碍时，会积累越来越多的错过城市化人口。<sup>①</sup>因为人口从出生到少年、青年、就业、退休、离世，有其生命周期，在最佳的窗口期没有能够进入城市成为市民，而当其年龄较大后，因财力、精力、技能、知识水平、生活习惯等因素，再不能够进入城市时，就成为了错过城市化人口。我们计算了应有城市化人口和现有农村人口之间，50岁以上的人口积累，发现中国错过城市化人口已经高达7643万人，占总人口的5.6%。这在计算未来中国推进城市化还能有多少动能时，需要将这部分对于继续推进城市化的无效人口予以剔除。(6) 从各个部分的分析数据和图表看，市民化的城市化滞后带来的损失，越在初始阶段，比例越小，越轻微，感觉不到；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过程越是到后期，在此过程中人口流动和迁移的体制障碍时间越长，其积累的负动能越强，国民经济损失的消费需求、居民收入和GDP产出比重和规模也就越大。也就是说，人口流动和迁移受阻，对于国民经济消费、收入和增长有着累积和放大的负效应。<sup>②</sup>

---

① 周天勇：《以产权改革为牵引推进经济中高速增长》，《清华国家战略研究报告》2017年第3期。

② 周天勇：《迁移受阻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1期。

## 收入向政府和市民及房地产商集中传导的生产过剩

一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其发展程度的不同，有着适宜的宏观税负率。按照发展经济学家们的测算，在一个国家从发展落后的状态向发达水平迈进过程中，以政府收入占 GDP 的 18%—25% 为宜。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高，但 2016 年世界 GDP 总量为 74 万亿美元，人口也是 74 亿人，全球人均 GDP 为 1 万美元。中国人均 GDP 为 8 100 美元，经济发展程度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比高收入国家最低门槛收入线 13 100 美元，还相差 5 000 美元。

然而，中国的宏观税费负担水平，2013 年高达 38%，2016 年略降为 36%；企业税负率高达 68%。宏观税负相当于美国这样发达国家的 37% 水平，而企业税负率则比美国的 44% 高很多。政府支出结构中，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和一般行政支出比例要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平均值要高。

制造业企业成本相对较高，也是中国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分配能力很弱、产业比较效益很低的重要原因。金融融资、交通运输、能源供应和土地分配等方面的自然、国有和行政寡头垄断，加上没有对其成本、价格和收益的第三方审计及社会听证，导致了竞争性的制造业和其他实体经济应有收入被这些行业所不合理地分配和消耗。

这样的政府与产业间收入分配的格局会对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1）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比较收益远低于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于是资金等要素大量地脱实向虚，以房地产业价格轮番上涨获得利润，或者干脆以“钱”赚“钱”，货币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倒“钱”获得利润。（2）在 GDP 的分配中，居民收入提高缓慢，而政府收入、房地产商收入、借贷倒钱者收入增长较快，使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增长，不适应于现在的生产能力和供给水平，传导生产过剩。

需要指出的是，当 20 年前人口生育率大于 2.1，或者当期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时，由于上期形成的生产能力总是小于不断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旺盛，税负等成本可以较为容易地通过价格上涨而转移给购买者。因此，当宏观税负率从 1995 年的 16.45% 上升到 2011 年的 36.09% 时，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仍然处于高水平状态，并没有因



税负等成本越来越高而持续下降。而当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规模减少，与此相关的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收缩时，上期形成的生产能力相对于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就开始过剩。较重的宏观税负和企业其他的高成本，无法通过价格上涨而转移出去。于是，就发生了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制造业投资收缩，形成持续动态的过剩，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

而就资本与劳动、技术与体力、富裕居民与低收入居民之间的关系看：一方面，产权清晰和市场调节，通过企业竞争，储蓄和资本积累及投资，技术进步，对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越来越显示出向少数人集中和集聚的趋势，重大技术产业化也是由少数高端智力的人士推动，财富和收入分配也向着他们流动和集中。然而，这种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方式，也传导生产过剩：收入提高的边际消费率递减，而边际投资率递增。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低，消费支出比例越高，投资率越低；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比例越低，投资率越高。这就使得财富和收入越来越向上层的少数富人流动和集中，他们进行投资建设，形成了日前扩大的生产能力；然而，在消费方面他们是一个小众群体。而劳动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中的能力越来越弱，依靠自我雇佣和工资等进行收入分配的广大群体，他们获得的财富和收入，相对于上层少数富人，越来越少。虽然他们对生产的投资能力低下，但是，他们是消费的大众群体。与日益相对扩大的生产能力相比，由于其收入相对增长的缓慢，其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增长，跟不上资本集中、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增强的速度。于是，形成了财富和收入向上流动和集中传导的生产过剩及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除了一些北欧发达国家外，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那么，中国有这种财富收入向上流动集中传导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放缓吗？我认为是有，但是有其特殊性。中国的财富收入差距，与一些国家不一样的是，不是市场竞争造成的，而是城乡差别性的户籍管制、公共服务、土地和住宅体制形成的；中国的最富有人和中产阶层，相当多的不是由创业办企业积累的，而是开发房地产和炒房地产造就的。一是户籍管制、公共服务不均和住宅价格及供给等体制，使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以及农业就业劳动力窝积过多，他们不能到城市进行创业，也不能到